

政治哲学史

总主编 张志伟 韩东晖 于春松

彭永捷 主编

中国政治哲学史

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治哲学史

总主编 张志伟 韩东晖 于春松

彭永捷 主编

中国政治哲学史

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哲学史. 第二卷/彭永捷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3
(政治哲学史/张志伟, 韩东晖, 干春松总主编)

ISBN 978-7-300-24254-5

I. ①中… II. ①彭… III. ①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8728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政治哲学史

总主编 张志伟 韩东晖 干春松

中国政治哲学史 (第二卷)

彭永捷 主编

Zhongguo Zhengzhi Zhexue Shi (Di-er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3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70 000

定 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儒学与传统文化、中国政治哲学史、儒教研究。主要著作为《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纵横家》，合著有《中国道家》《中外儒学比较》《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君子国智慧——韩国哲学与21世纪》《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圣境——儒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等，主编有《人文奥运》《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国学的视野和新诠释》《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经学史、出土简帛等。著有《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等，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入选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四个一批”社科理论人才等。

秋风 本名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政治思想史》（季刊）学术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儒家传统。博士论文为《南宋儒家经制之学的兴起：论薛季宣和唐仲友的经世思想》，代表著作为《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编著有

《儒家与宪政论集》。

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与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作为《理学与佛学》、《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理学体贴卷》（合著）。

段海宝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编审，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司马光哲学思想新探》，合著有《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代表论文有《司马光中和思想试论》。

杨汝清 苇杭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孝道与礼乐、书院文化、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著有《〈孝经〉与成功人生》，代表论文有《以孝治天下——儒家治国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可行性初探》《传统孝道与现代法治》。

曹婉丰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禅让与改制》，代表论文有《从经典诠释到秩序建构——以王莽依经改制为中心》。

岳 晗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中国政治哲学史、儒家传统文化。博士论文为《朱熹政治哲学研究》，著有《家国情怀：儒家与族谱》，代表论文有《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当代书院复兴》《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华文化复兴》。

秦晓慧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自然与太平——〈太平经〉自然政治哲学发微》，代表论文有《“欲而不贪”——论孔子节欲观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益》《生命的困苦与超越——论庄子的生命智慧》。

秦际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儒学、蜀学研究、汉代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白虎通义〉研究》，代表论文有《作为经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学与经世观念》《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刘璞宁 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区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哲学、隋唐哲学。硕士论文为《重塑王道——王通政治哲学研究》，代表论文有《王通的政治道统论》。

总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政治哲学史”丛书，包括《西方政治哲学史》（三卷）、《中国政治哲学史》（三卷）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一卷）。

哲学中的政治哲学理论历史悠久，但是在 19 世纪以后沉寂多时，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所取代，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政治哲学才得以复兴，并且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因其与社会现实在实践性指向上具有密切关系，当代政治哲学俨然成为哲学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政治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影响，政治哲学逐渐成为汉语哲学界的显学，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在基本史料的积累、经典著作的译述、基本概念的厘清以及最新学术前沿问题的追踪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与进步。迈过新世纪门槛之后，全球知识界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启蒙动力日渐衰微，现代性一再遭受质疑，新自由主义面临危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处在探索之中……如此种种，给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此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的双重促逼下，越发凸显出中西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相比，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毕竟刚刚起步，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当薄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掌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势，了解哲学家们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为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和主要参照系，乃是中国政治哲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何总结出中国政治哲学的独特意涵，发掘传统资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的积极作用，深入关注中国现实，回应中国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亦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开展的工作。有鉴于此，我们向中国人民大学申请了“政治哲学史（中西政治哲学研究·第一期·七卷本）”这一“重大基础研究计划”，希望立足国际学科

前沿，体现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凝聚各高校的优势，培育新兴的政治哲学学科，集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学科中相关的学术力量，借助对这些领域内政治哲学的深入研究，为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激发哲学对于当代社会的“批判性”作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政治哲学史”就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

关于这套“政治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有必要向读者做一些解释和说明。

第一，我们这套“政治哲学史”虽然名为“政治哲学史”，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距离全面、系统、详尽的政治哲学史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虽然近些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毕竟基础比较薄弱，梳理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基本范畴也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现在编纂一部全面、系统、详尽的政治哲学史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据此，我们这套七卷本“政治哲学史”主要按照历史的顺序，突出那些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此同时，强化学术研究的深度，以某个问题或主题为研究的核心，以此叙述策略来架构政治哲学史的大框架，意在为将来编纂更加全面、系统、详尽的政治哲学史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第二，与此相关，这套“政治哲学史”的编写模式是，基本上每一章研究一位哲学家或一个流派，并且强调突出相关的主题而不要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哲学家或流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因而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作一篇围绕一个人物或流派而展开的论文。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政治哲学史的整体性线索上多做文章，但是由于问题意识的自觉、思想谱系的传承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衬托，实际上各章内容之间自有其紧密的相关性。当作者们围绕各自的主题深入论述时，历史背景、问题演变和发展线索已然隐含于其中。

第三，我们这套“政治哲学史”是集体合作的结晶，编写者包括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他们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基本上实现了项目启动之初就确立的“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章节”的编写原则。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个别重要人物思想的介绍和阐述由于没有合适的写作人选，暂时付诸阙如，以待将来再做补充。

第四，虽然政治哲学历史悠久，但是作为专门的学科领域，政治哲学的历史并不长，其基本研究范式以欧美学术界为主导。不过，作为对各种政治概念、问题和方法的研究，各种政治哲学思想蔚为大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思想资源、现实难题和研究方法均有共同和共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同的理论背景和价值取向，也使西方政治

哲学史、中国政治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的编纂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色。我们这套“政治哲学史”的尝试，是以各自的学科取向为基础的。相对来说，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比较成熟，问题、方法与理论的线索比较清晰，而中国政治哲学则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由于中西在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以至于学术界关于什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等基本问题迄今尚未达成共识，因此三卷《中国政治哲学史》具有很强的探索性。与此类似，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一种政治哲学乃至如何构成一种政治哲学等问题上亦存在着争论。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这套“政治哲学史”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部分主要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至于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丰富内容则有待来日补充。我们希望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国政治哲学界在学习、借鉴、吸收的基础上，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变局，推出富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深化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史的研究。

总而言之，由中国学者编写的这套“政治哲学史”包括《中国政治哲学史》《西方政治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在学界尚属首次。我们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共同努力，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进一步健康发展。

最后，我们要向本套“政治哲学史”的各卷主编和参编的专家学者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国家出版基金为本套“政治哲学史”提供出版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潘宇女士和编辑们为本套“政治哲学史”的出版所做的辛勤工作。这套“政治哲学史”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批准号：11XNL007）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志伟 韩东晖 于春松

2017年1月1日

目 录

前 言	彭永捷	1
第一章 董仲舒论天人之际的治道	秋 风	7
第一节 董仲舒之问题意识		8
第二节 元：更化的动力		12
第三节 天人之际		19
第四节 以民从君，以君从天		26
第五节 法天而治		35
第六节 德教		41
第七节 学校、选举与士大夫		45
第二章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王莽“受禅”与改制	曹婉丰	53
第一节 从尧舜禅让到王莽“受禅”		54
第二节 经典诠释与秩序建构		68
第三节 再辨德与位		81
第四节 得天下与治天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与维系		91
第三章 《白虎通义》的教化哲学	秦际明	101
第一节 三统论		101
第二节 礼乐论		113
第三节 纲纪论		128
第四章 《太平经》的自然政治哲学	秦晓慧	138
第一节 自然政治哲学		141
第二节 自然政治哲学渊源		147
第三节 《太平经》的自然思想		154
第四节 太平之世的政治理想		158
第五节 “致太平”的施政原则		161
第六节 政治实践——黄巾起义		173

第五章	王通的正统论与道统论	刘璞宁	183
第一节	王道正统论		184
第二节	王道道统论		196
第六章	韩愈的仁义道统论和文化中国说	杨汝清	210
第一节	唤醒儒家的古文运动		211
第二节	世存经典辨华夷		237
第七章	王安石的新外王政治哲学	梁 涛	256
第一节	北宋儒学的整体规划与引庄入儒——王安石 政治哲学的历史、思想背景		256
第二节	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王安石的政治哲学 建构		261
第三节	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王安石政治哲学的 定位与评价		269
第八章	司马光的礼治政治哲学	段海宝	277
第一节	国家治乱本于礼		279
第二节	礼治秩序		288
第九章	朱熹的天理秩序	岳 晗	296
第一节	天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297
第二节	亲亲、尊尊——理想家庭秩序的设计		305
第三节	格正君非的政治设计		314
第十章	南宋浙东学派的经世哲学	任 锋	334
第一节	观察浙东学派的新视角		335
第二节	浙东学派的法度论		338
第三节	治人主体的政德养成问题		350
第四节	浙东学派的历史观和浙东道论中的认识论 与本体论取向		361
第十一章	黄宗羲的分权政治哲学	王心竹	381
第一节	以三代之治为理想目标的政治设计		381
第二节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具体落实		394
第三节	民主启蒙还是传统民本：围绕黄宗羲政治 思想的论争		412
索 引			418

前言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二卷。这一卷承担的内容，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涵盖了从汉代至明末清初的漫长岁月。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语境里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古老的裂土而封的封建制已经解体，秦统一六国尝试以郡县制来建设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体制，却因片面重视发展硬实力和过度崇尚以暴力来维护和运行权力而成为短命王朝。汉代先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独崇六经”，才确立了新型大一统王朝和立国宏轨。即便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些作为治国理论依据的儒家经典，协和一个广土众民的庞大国家依然绝非易事，历史的种种处境留给每一个王朝的政治问题都很复杂，新兴王朝或者面临重新选择主导意识形态问题，或者面临王朝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面临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政治正统性问题，或者面临王朝内部如何改革调适的问题，或者甚至面临君主政制是否还有必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史、思想史以及相关的政治制度史，绝非某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眼里所谓的循环与停滞，而是种种具体生存处境下的认真思考和努力应对。如果缺乏对古代中国历史的认知，那么便难以了解中国先民曾面临的具体处境，从而也难以对古代中国人治国的思想和得失有清醒明白的认知。比如，在今人的印象中宋代似乎是积贫积弱的王朝。毫无疑问，宋朝的确不是一个统一了中国传统疆域全境的王朝，只不过拥有传统疆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然而国力上强盛的汉唐在宋人的口中却是“百世无善治”，所得评价很低。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广大区域难逢敌手，宋王朝却持续抵抗了半个世纪之久，宋的襄阳、樊城军民仅依靠邻近的两座城池，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下勇敢抵抗达七年之久。宋人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与抵抗外族所展现的不屈与韧劲，让所有回顾历史的人不得不到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儒学

形态——理学中寻找观念上的原因。人们只有努力找出宋人那些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的思考与共识，才能理解宋人为什么如此深爱自己的文明成就和生活样式，才能理解宋人为什么为了保护维系王朝国家而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同样，只有从史书上了解到明代以前在野蛮的草原民族长期屠杀和残害下，中国这方土地上生民十不存一，人口从一亿多骤降至不足千万，在这种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极端困境下，人们仍然未曾放弃他们对文明和野蛮的理解，未曾放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自己的文化，再去阅读其时儒生的著作，才会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在用生命书写文明，他们凭着韧劲去驯化野蛮民族，最终使马背上的征服者为中原文化所征服，也才会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未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度，自然也才会明白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突然衰落了这个问题完全问得多余。本书的作者们致力讲述古代人的政治世界，在他们看来，我们愈是了解古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愈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离我们虽然遥远，但他们关于人类应有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样式的种种理解，对我们今人依然充满启迪和鼓舞人心。

作为本卷的前言，在此有几个问题，分别向读者作些交代。

第一，关于政治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的区别。

虽然整套“政治哲学史”都面临着上述问题，但在此也尝试着就本卷承担的具体内容作些说明。我们以往读的那些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学说史著作，以及某些名不符实的政治哲学史著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着重于全面、系统地阐述传主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学说，将其中的主要政治观点和思想逻辑介绍清楚。而政治哲学史的出发点则是政治哲学，依据政治哲学关注的政治价值、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诸要素，集中阐述古人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构成此种美好生活应有的秩序和达成理想之治的具体实现方式。政治哲学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来自政治哲学这一学科，对此不用讳言。政治哲学借鉴自西方学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来重新理解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相较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或许更接近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质。诸子百家皆务于治，而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简单说就是“政”达成于“治”。什么是“治”？一谈到“治”，自然就涉及作为评判政治好坏的政治价值、作为理想之治的政治秩序，以及从政治价值出发达成理想之治的政治制度。比如，儒家在政治哲学上从“仁”或“仁义”的价值出发，试图通过“选贤与能”、礼乐刑政的方式达成“大同”之治，道家、道教则以“自然”为政治价值，在神

权及其代表“大贤良师”的导引下达成“太平”之治。自从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儒家在政治上的正统独尊地位，其后历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不断回溯和重新理解儒家的“仁义”之道以调整或解决王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至明末的思想家认为君主制的躯壳再也容纳不下儒家的“仁义”内核，他们有的主张重新恢复“封建”以回归仁义，有的主张探索“虚君”、士人众议的新型政治制度以回归仁义。总之，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和理解古代人政治思想的视角和维度，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和致思方式。

第二，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以往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要么按照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分期办法，诸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当成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附庸，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按阶级形态来划分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发展，这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在学术界通常都不再采用这种做法。笔者认为，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来看，中国政治哲学史大体上应当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典籍中所传述的唐虞三代。唐指唐尧，虞指虞舜，三代指的是“三代之英”，夏、商、周（西周）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圣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被后世作为历史“故事”取之法之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从礼崩乐坏到“独崇六经”。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从“古之道术为一”到“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这个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百家”，并非指学术派别划分的“家”，而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家”。《汉书·艺文志》具体罗列了189家之多。可见百家实有其数，并非虚指。“独崇六经”，后世称为“独尊儒术”。治国之道从秦用法家，经汉初用黄老之术，再到独尊儒术。汉代人重视“术”更甚于“道”，先秦的“道术”一词到了汉代人那里，说法就变成“术道”，术放在道的前面。这个阶段是从“道术为一”，经过“道术为天下裂”，再重新到“道术为一”。在政治实践的检验中，单纯讲求效率和硬实力的法家、清静无为的黄老先后被淘汰，儒学被定于一尊，但这时的儒学就像汉初的黄老一样，业已过了学术上对百家的兼采、融汇阶段，“霸王道杂之”。前两个阶段的内容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中得到反映。第三个阶段是从“独尊儒术”到近代以前。这是在儒家处于独尊地

位以后，每个王朝不断根据自身的处境来应对自身政治问题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有中原民族与统治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断上演的侵袭与反侵袭，数个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的主动汉化，有的则建立起种族统治；有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取天下甚至改朝换代的武装起义，像汉代的黄巾起义，就是有指导思想、有政治纲领、有严密组织、有实施计划和步骤来夺取天下的造反起义；有君主扩张君权与士大夫依据儒家道义限制君权和匡正君主的体制之争。这个时段由本卷政治哲学史来反映。第四个时段，则是从清末西欧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产生“天崩地解”的影响开始，也就是最先殖民侵略全世界的西欧国家及后来兴起的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内有愚昧、残暴的清王朝野蛮统治，外有西方强盗国家野蛮侵略，在这双重野蛮压迫下自强、求新、求变，重构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段的内容由《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来反映。

第三，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选材问题。

本卷选取了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人物、历史事件和政治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在政治人物方面，选取了董仲舒、王通、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提出“复古更化”“独尊儒术”的儒学家，不了解他的思想也就说不清汉代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内在理由。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儒生，其门人弟子称其为“王孔子”，他的著作被称作“王氏六经”。王通是比韩愈等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更早发起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很早就意识到儒学的危机，也很早就提出了要重新复兴儒家的仁义的思想。在民族杂糅、融合的时代，他也很早就从理论上来处理道统与正统这样的政治课题。王安石和司马光则是北宋变法问题上的对头，虽然他们的学术出发点都是儒学，依据的是同样的儒家经典，但王安石提供了一套支持变法的儒家学术，司马光则提供了一套批评变法的儒家学术，儒家学术的解释力和创造性在变法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朱熹是宋代理学中道学一系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宋代儒者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角度重新理解儒家以仁为核心政治价值追求，把仁解释为主宰着气化流行生生不已，作为“生理”与“仁理”合称的“天理”，并从天理的角度重构中原民族应有的充满生生之仁的天理世界。他的学术思想重申了二程兄弟对遥远圣王时代的取法和对后世历代与现世政治的批判，“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横肆”“千载无真儒，百世无善治”。为皇帝授课每日只讲“诚意正心”四字以“格君心之非”的理学，拥有已经迈向近世甚至现代门槛的学术气质，展现

了宋代士大夫从儒家经典出发构建理想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极致，这也成为后世许多学者将宋代视作中国古代历史文明水平顶峰的原因。陈亮、叶适则是宋代理学之外的儒学派别功利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功利的角度解释儒学的功能，以纠正宋儒中普遍存在的过于重视义理而轻视功利的片面性。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度，认为君主制度已经从施行仁义、造福人民的器物变成妨害仁义、残害人民的桎梏，儒家仁义之道应当另寻新的下达之器，他提出了“公其非是于学校”“虚君”等许多设想。虽然在文化上、观念上、制度上野蛮落后的入主中原者打断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从黄宗羲“明夷待访”等候来者的思考中，仍然能看到儒家文化积极解决自身问题向近代化或现代化自发演变的内部可能性。

相较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视人物而轻视重大事件和重要政治文献的倾向，本书希望在选材上尽量照顾得全面一些。这样选材的理由在于，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的政治辩论和重要政治文献记载的有关政治问题的集中讨论，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本身的认知。相较于单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这些事件或文献，对于生活在如今时代的人们了解古人的政治生活及其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思考，提供了聚焦式的直观观察。

关于政治事件方面，我们选取了王莽受禅与改制这一重大事件。以往有关王莽受禅与改制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研究方面，研究者们的兴趣往往在于讨论王莽受禅究竟是合理的禅让还是精心的篡夺，分析王莽建政失败的原因。本卷的研究者则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围绕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时人之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观点，从禅让问题、德与位的问题、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与维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完全按照儒家经典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政治条件之间关系诸方面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在政治文献方面，我们选取了汉代学者和官员讨论治国道术的文件汇编《白虎通义》和汉代流行且被黄巾起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道书《太平经》。在由汉代中央政府召开的以治国指导思想这一重大国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呈己见，相互问难、辩论。研究者尝试从中整理出《白虎通义》这一政治文献所反映出的汉代人的政治意识、政治问题、政治语言和政治思维。《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以“自然”为基本政治价值，以“太平”为理想之治的政治哲学，相较于儒家以“大同”为理想的“中国梦”，《太平经》则提供了另一种以“太平”为理想的“中国梦”。

最后说一说本卷的写作分工。本卷的写作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每位

撰稿人承担的论题都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并进行过深入的前期研究。撰稿人以此为基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严谨地分析和论证，用心地向读者表达他们的真知灼见。本卷的具体分工如下：彭永捷撰写了“前言”并负责组织和初审稿件；秋风（姚中秋）教授承担了关于董仲舒的部分，曹婉丰博士承担了有关王莽受禅和改制的部分，秦际明博士承担了关于《白虎通义》的部分，秦晓慧博士承担了有关《太平经》的部分，刘璞宁博士承担了关于王通的部分，杨汝清博士承担了关于韩愈的部分，梁涛教授承担了关于王安石的部分，段海宝博士承担了关于司马光的部分，岳晗博士承担了关于朱熹的部分，任锋教授承担了有关陈亮和叶适的部分，王心竹教授承担了有关黄宗羲的部分。作为本卷的主编，对参加本卷写作的各位学者的辛勤写作和通力合作表示感谢！

彭永捷

第一章 董仲舒论天人之际的治道

董仲舒是汉代博学的儒家学者。他以目不窥园的刻苦与勤奋，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天地万物无所不究。董仲舒将儒家的仁义思想与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和谶纬学说相结合，努力使汉王朝重拾儒家由上古政治传统所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原则，从而使政治重新回归正确轨道，也就是儒家经常说的“不可须臾离”（《中庸》）的“常道”。董仲舒立足于经，综合孔子以来的各家学说，发展出复杂且较为完备的义理体系，并以此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之根本变化，奠定此后两千年之政制大局。从儒家义理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实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人物。

今日探讨董仲舒思想，主要依据的是残本《春秋繁露》与《汉书·董仲舒传》所收对武帝三策。纵观《春秋繁露》全书，可见董仲舒的思想明显分为两部分，或者说董仲舒的思想有前后两期之表现：上部为《春秋》学，推明《春秋》大义，主改制；从《阳尊阴卑》始为下部，推阴阳之变，主更化。^①对武帝三策，则将二者糅合为一体，而以推阴阳为本，此可视为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成熟者。

^① 徐复观先生述董仲舒思想，即分为两部分，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